

從帝國櫥窗到南島觀點：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臺灣原住民展示

蔡承豪¹

Transform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The Aboriginal Taiwanese Exhibit at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Cheng-Hao Tsai

關鍵字：帝室博物館、臺灣原住民、展示、殖民統治、解殖

Keywords: Imperial Museum, Taiwanese aborigines, exhibit, colonial rule, decolonization.

¹ 本文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mail: daydream@npm.gov.tw
(投稿日期：2018 年 2 月 27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摘要

博物館透過空間安排，保存了各式記憶，並搜集各樣有形或無形的自然及文化遺產，再藉由典藏、展示與教育活動予以鋪陳、轉化及呈現。然而，看似中性的社會教育機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卻曾是見證國家擴張的收藏室，也是知識宰制的重要據點，若干蒐藏與展示實蘊含了殖民的權力關係。而國立博物館往往作為國家文化呈現的指標象徵，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即扮演如此代表性角色。在東博的典藏當中，富含來自皇室、臺灣總督府、公私機構及各藏家所捐贈的臺灣原住民文物，質量在該國皆位居前茅，並有公開陳列。其展示係隨著國家政治氛圍的轉變、博物館內部體系的更迭，以及各時期原住民文物的充實，而隨之變遷。在博物館草創初期，文物採外借予日本各地的博覽會，以充作日軍海外揚威及呈顯異國風貌的景況。至博物館正式成立，則作為常設展的項目之一，被設定為「外地」風俗，與蝦夷、琉球等地文物共置一室，置於日本與外國文化展廳之間，透露出當時的政治視角。惟因 1923 年關東大地震帶來的館舍損失，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氛圍的轉變，臺灣原住民文物不再作為常設項目。但藉由 1968 年東洋館的新設，又再開啟公開展陳，近年更以「アジアの民族文化」為題，於南島語族的子單元內展出達悟、排灣等族文物。透過新的契機，臺灣原住民文物得以從帝國的展示櫥窗，重新轉換為南島觀點出發的展示。透過探查東博展示觀點的流變，應可讓我們省思如何更積極去面對及呈現臺灣原住民多元的歷史。

Abstract

Museums use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exhibits that collect various kinds of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order to preserve historical memory. Through collections,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al events, museums present, elucidate, and transform such heritage. However, what may at first glance appear to be a neutr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s in fact a collection bearing witness to national expansion in a specific socio-temporal context, and is also a form of epistemological domination—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d exhibiting a museum collection does indeed implicate a colonizer–colonized power relation. National museums are often used as symbol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TNM) plays an integral role in Japan. The TNM has opened up to the public its first-rate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aboriginal artefacts donated by the Imperial Household, the Governor’s Office of Taiwan,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and various collectors. This exhibit has evolved along with changes in the Japanese political climate, successive TNM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gradual accumulation of additional exhibits. When the TNM was first created, it would lend exhibits to exhibitions across Japan in an effort to reflect Japan’s military might overseas and bring out a taste for the exotic. With the TNM’s official opening, the Taiwanese aboriginal exhibit was made part of its “Customs from Elsewhere” permanent exhibition, along with exhibits on the Ainu and the Ryukyuan peoples, and placed in a room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exhibition halls, an ind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ime. With the damage to the main building in the Great Kantō Earthquake of 1923 and the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climat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aiwanese aboriginal cultural relics were no longer included among the permanent exhibits. However,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Tōyōkan (Asian Gallery) in 1968, they were returned to public exhibition, and in recent years a Cultures of Asian Peoples section was set up in the Austronesian display,

including the Tao and Paiwan peoples of Taiwan. This wa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remove the Taiwanese aboriginal artefacts from the framework of empire and reposition them in the Austronesian context. By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NM's perspectives, we can reflect on how we ourselves can more proactively recognize and represent the diverse history of Taiwan's aborigines.

壹、前言

回顧博物館的發展歷程，其面貌與所處的整體政治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反映了時代環境變遷、社會價值觀與社會期待，以及國家政策等各項因素的總和。在現今社會，博物館除是一個展示教育的場域，更是一個「記憶所繫之所」。博物館透過空間安排，保存了各式記憶，並搜集各種有形或無形的自然及文化遺產，再藉由典藏、展示與教育活動予以鋪陳、轉化及呈現。而收藏是博物館保存文物的重要步驟，但同時文物脫離原本社會文化脈絡的過程，背後糾纏著複雜的社會關係和多重動力。

一座國家級博物館，可視為該國某種宣示性面向的櫥窗，其成立與展示內容自甚受國家政策的影響。以日本為例，在 19 世紀中葉，該國先是於西方勢力的挑戰下被迫重新調整外交政策，後隨與歐美頻繁互動接觸，統治階層及有志之士體認到國家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發動明治維新，致力建立起一個近代新國家。日本人類學就在帝國主義和確立「皇國」意識的民族主義氛圍中形成，一方面受自身文化、社會條件影響，發展脈絡循著民俗學的軌跡前進；另一方面，接受西方人類學中的進化論，關注異文化他者的比較研究。並效法歐美，以民族學標本的陳列，被當作文化演化證明，及彰顯新興近代國家權威的符碼（呂怡屏，2012：96）。而政府鑑於博覽會與建設博物館預期所帶來的商機與智識普及之影響，將之設定為殖產興業下的目標，且建立一重量級的博物館，甚有助於國家權威的建立。這個博物館便是現今位於東京上野、該國最早設立的公立博物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東博」）。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代表性的博物館內，典藏有千餘件的臺灣相關文物，除曾作為短期巡迴展的素材，後更作為常設展項目數十年。這是其他擁有臺灣文物的海外博物館少有的展示活動，甚值得關注。因自 19 世紀中期起，不少臺灣文物陸續踏上離散海外的旅程，隨著來臺的西方領事官員、傳教士、探險家和研究者腳步，逐漸流動到歐美普世性博物館（胡家瑜、歐尼基，2018）。日本與臺灣本在地理位置上便相去不遠，兩地在歷史上並有著

緊密的聯繫，除十七世紀的貿易往來，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更將兩地同捲入東亞近代地緣政治體系下。1895 年起，日本直接領有臺灣，隨著殖民統轄，為數可觀的臺灣民族學標本透過殖民、帝國和科學主義在世界糾纏蔓延發展的過程，輾轉跨越國界飄洋過海前往東瀛，可謂是區域歷史和人群千絲萬縷複雜互動下的結果。而當中日本最值得注意的據點，除了東京帝國大學，更莫過於是東京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東博」）²。

那作為日本代表性的國家博物館，其如何取得臺灣原住民文物，又用何種角度來詮釋展陳，著實是一值得探究其內容及背後意涵之課題；尤其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展示，現今探討者多半集中在臺灣或者歐美之案例。關於東博的原住民展示，該館的機關誌——《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內，雖略有提及臺灣文物的取得與展示，惟僅作為紀錄且甚為簡略。要至陳文玲藉由親身前赴東博的調查所得，外界方可較系統性的得知該館內臺灣文物概況，但陳文玲並未碰觸到文物展示的部分（陳文玲，1996）。僅陳其南根據牡丹社事件後日本所編纂的《處蕃始末》，指出日軍曾在恆春半島取得原住民文物作為戰利品，日後部分文物曾在國內博覽會中展覽（陳其南，2010：98-100）。但整體而言，關於東博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如何被「納入」做為該館展示的一部份，及展示內容的流變情況，至今仍甚缺乏研究。

因此，本文運用官方檔案、出版品、時人記載、新聞報導，搭配筆者在 2017 至 2018 年間多次赴東博進行訪查時所獲得的相關典藏資料及展覽觀察，分就數個面向進行探討。首先要解明臺灣原住民文物為何會流入東博；其次，試圖重新建構東博初始迄今，該館內原住民展示的樣貌變遷。最後，希冀藉由此議題，探討日本的人類學與博物館界，如何透過博物館這個公眾展示場域，在不同的時代氛圍中呈現與詮釋臺灣原住民。

² 國立東京博物館前身名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稱呼（詳見第二節討論），故在行文當中，以東博作為概括性的統一簡稱；惟如有指涉特定時期，仍會以該時期的稱呼為全稱。

殖民離散與文物流動

西方人類學的發展，隨著國家力量與殖民主義的擴張，使民族學的調查採集和專業博物館的設立，在 19 世紀中葉後於歐美社會逐漸興起，並向外蔓延。隨著這股熱潮，大量的民族文物以錯綜複雜且多元的流通管道和取得方式，被採集並離開原使用地。故博物館這個各種文化的相遇與碰撞「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其實亦是殖民相遇的場所，呈現了地理與歷史上本來區隔的人群，在接觸到彼此並開始持續的關係，而此關係通常涉及強迫、極度地不平等與棘手的衝突。內容的呈現，往往亦涉及了展示權力的競逐。

就族群展示而言，誠如 Tony Bennett(1995)、Sharon Macdonald(1998)等學者研究所指出，博物館係是利用知識、意識形態及機構等手段，來作為建構權力的治理術之一。諸多臺灣學者，更環繞著臺灣原住民的議題，探討並反思博物館內的族群展示所隱喻的意義。如許功明(1998)藉由原住民展覽探討博物館的展演政治，而王嵩山(2012、2015)則解構博物館的權威與知識的建構，盧梅芬(2015)則指出博物館展示的他者與異己再現的後殖民觀點，另李威宜(2014)亦透過觀察後威權時代臺灣的博物館族群展示，來反思「文化再現」與「展覽規訓」等議題。

展示當中所不可或缺的博物館內民族學藏品，其流動與蒐藏之脈絡亦是研究者關心的重點之一。Peter ter Keurs 曾經將民族學藏品的取得和採集，大致歸納為五種方式：(1) 科學探險調查，(2) 個人採集，如傳教士、領事官員和其他旅行者，(3) 殖民博覽會，(4) 戰爭掠奪，(5) 禮物或小規模購買。(引自胡家瑜，2012：7-8) 上述途徑取得的文物，除收藏於個人之手，為數不少流入博物館成為典藏，作為展示的陳列品及研究、詮釋特定文化的輔助文物。故博物館這個看似為中性的社會教育機構，在殖民過程中，一度曾是見證國家擴張的收藏室與知識宰制的重要據點。透過訊息與交換，組織出複雜且利益特殊的社群網絡，也觸及掌握收藏資源的權力。尤以在民族國家的發展中，教育成為被掌控的一環，加上 18、19 世紀的民族主義與海外擴張，國族概念已深烙在人民心

中，博物館在性質與任務的要求下，進行異文化的標本蒐集展示，除彰顯出自身文明的強大，亦彷彿向觀眾陳列出國家的「戰利品」（李尚仁，2003：37-44；李子寧，2011）。

而如此的文物流動，則與殖民體制所帶來的離散息息相關。在殖民展示的需求下，使得文物在國家的力量下，藉由研究或展示等殖民者的需求，也輾轉流動離散至不同地方，陸續自原居地流離散落各方，並進而轉至不同的博物館被典藏成為文物。

且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帶動運輸工具革命與科技產業發達，賦予都市更豐富的面貌，並奠定近代化基礎，也帶動了大量新商品的誕生。1851年，英國更在倫敦中心的海德公園(Hyde Park)，舉辦以「世界各國之工業」為主題的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欲彰顯其傲視世界的國力及文明聲威，並的確帶來轟動的效果，寫下近代博覽會發展史的第一頁。此後，歐美各國競相舉辦大型博覽會，在競爭與展現進步間，世界博覽會成為「經濟、科技與文化的奧林匹克盛會」（呂紹理，2011：47-76）。

在這類刻意為之的展演活動中，博物館這個特殊空間也被納入成為展示場域，館藏的豐富物件便成為呈顯特定意識的標的物。故博物館中性的典藏與展示，及其背後的政治權力，正凸顯了相當的矛盾性質。尤其特別顯現於跨洋越洲進入境外博物館的收藏，更涉及全球化進程與跨文化採集歷史。過往，博物館常被視為殖民治理的體現機制之一，然隨著近年族群展示中對於相關議題的多元包容與相互尊重之重視，也讓擁有民族學文物的各博物館重新去面對與思索其所呈現的方向與內涵，甚至去碰觸解殖／去殖等相關議題，試圖以更多元的觀點來從事展示。

從帝室博物館到國立博物館

日本擁有悠久的歷史、特有的文化脈絡，及獨特的風土民俗。但在近代

西力的衝擊之下，其亦仿效西方建立博物館制度，而東博可謂是當中代表性的指標。

（一）西力衝擊下的大博物館構想

至 19 世紀後半，面對西方勢力的進逼，日本走入了近代化與西化的洪流當中。明治政府實行「文明開化」政策，欲以西方為標竿，進行大力變革。日本原就有物產學、物產會、社寺開放等活動以作文物展示，有著博物學的基礎，惟多半侷限於特定階層內，尚無固定對外公開（畑中彩子，2014：40-41）。即便透過荷蘭人傳入的蘭學而有所認識，但整體而言，對於西方博物館界的動向僅有粗淺的理解。至幕末，日本多次派出考察團赴歐美調查，另有自行接觸歐美文物的武士們等等，開始多方面吸收大量西方制度與設施（建築物與展示品等）的見聞，方真正感受到直接的衝擊。包括福澤諭吉(1835-1901)在內的參訪者，對於西方盛大的博覽會與壯觀博物館，及其所引發廣泛交流與商業效益，留下極深刻的震驚印象，返國後並積極介紹所見所聞。此類記錄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福澤諭吉的暢銷書籍《西洋事情》。福澤諭吉認為，歐洲的博覽會匯集千萬種的物品集中於會場內的大型建築物內，除可讓民眾觀覽新奇，尚有教學相長的效果，這樣的觀點可看出與日本過往傳統的展示會有相當大的差異。

而鑑於博覽會與建設博物館預期所帶來的商機與智識普及之影響，並為與歐美列強對抗，吸收海外先進的技術，明治政府遂將之視為「殖產興業」政策下一環。先是設立了大學南校物產局³，並在 1871 年（明治 4 年）5 月於東京招魂社大祭之際一同舉辦「物產會」，藉此蒐羅諸多文物以作展示。另為應對厭舊尚新風潮下可能帶來的破壞，也促成太政官於同月公布「古器舊物保存布告」，督使各地方調查與保護古器物，為日本文化財保護行動的開端。而在布告公布後兩個月，明治政府正式設立文部省，並在其下設置博

³ 知名的日籍博物學家與農事官員田中芳男(1838-1916)便任職其中。

物局，接收幕府時期物產局所收集的各種資料。尚派出文物調查團，至各重要古寺、藏閣、貴族家等進行調查（「王申檢查」），藉此掌握重要文物蒐藏地之情況。

至 1872 年（明治 5 年），文部省博物局更於東京湯島聖堂大成殿內，舉辦了國內首次大型博覽會。此次博覽會舉辦的目的，除了延續文化開化之精神，廣集日本各地物件以示眾人、拓展智識，更重要的是為隔年日本受邀參與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而預作物件收集及展示。為能在國際上宣揚日本文化，明治政府特設立博覽會事務局，處理初次參加海外博覽會的相關事務。湯島聖堂博覽會於 3 月 10 日開幕，除展示農業、工藝等新式製品外，並匯集諸多難得一見的珍奇書畫、古文物、動植物標本等，如名古屋城的金鯨、東漢光武帝授與倭奴國王的金印等。展期原預定為期 20 天，不料卻盛況空前，閉幕日期一再延後，至 4 月 30 日方告一段落。而博覽會落幕後，文部省博物局鑑於參觀的熱潮，決議將湯島聖堂大成殿作為的博物館，對外限時開放，這個博物館即是今日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第一代前身。以此為契機，日本更欲仿效歐美創設一個正式的博物館。但是要何種形式的博物館，各方面則有不同的意見。

當時主要的推動者之一，是出身薩摩藩士、曾參與調查日本境內珍寶的「王申檢查」，日後擔任第一任博物館館長的町田久成(1838-1891)。他最初構想的博物館是一個架構龐大，包含人文、自然史、產業等部門，且兼備動物園、植物園與圖書館的大博物館，並以因幕末戰亂而一度荒廢的上野寬永寺本坊舊址作為建設預定地。但當時官方機構更迭快速，1872 年設立的博覽會事務局，1873 年（明治 6 年）先是與博覽會事務局、書籍館、博物局、小石川藥園等單位合併，由湯島遷址至內山下町（現東京都千代田區內幸町），但這個機構只短暫的存在至 1875 年（明治 8 年）1 月而已。

至 1877 年（明治 10 年），因官方於上野舉辦的首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並建設了「美術館」，再使博物館的遷址出現契機。且為讓後續的博覽會得以有專用建築，並仿效歐洲，讓日本皇室轄有一個代表性博物館，以加強皇

家權威，大博物館的計畫方再度復活。然因國家財政不算寬裕，幾經波折，1881年（明治14年），磚造二層樓的博物館本館終於竣工，作為第二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美術館使用。翌年，博物館由山下町遷至上野，進駐新建築，並正式開館。

當時博物館與博覽會相同，皆為傳播新知識、新技術的角色，具有殖產興業的色彩，因此博物館曾先後被內務省與農商務省所管轄。但到了1886年（明治19年），為了充實皇室，並藉由大博物館提升國家的門面，博物館與上野公園一同併入皇室資產，歸宮內省管轄，名稱更替為宮內省「博物館」，宣告以殖產興業為目的之博物館政策實質性結束，改為走向皇家寶物館的道路，確立該館於日本博物館界的中心地位。

（二）從皇室走向國家

1889年（明治22年），因日本憲法的公布，博物館改名「帝國博物館」，同時設置京都、奈良兩館，由東京帝國博物館同時管理。1900年（明治33年），帝國博物館更名為「東京帝室博物館」，理由在於當時帝國議會、帝國大學、帝國圖書館皆由政府管轄，而博物館屬於皇室，則應冠名帝室加以區分。後博物館的建築群仍持續擴張中，藉由慶祝皇太子（日後的大正天皇）大婚，眾官紳合力捐貲，共匯聚兩萬三千餘人、約四十一萬日圓的資金，新建了歐式富麗堂皇的表慶館，於1908年（明治41年）落成，命名為「表慶館」。隔年正式開館並公開展示1900年參加巴黎萬國博覽會的古美術作品，其後每年並持續舉辦特展，現在該建築被指定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1923年（大正12年），受到關東大地震的影響，帝室博物館失去大半館舍，包括初始的初代磚造本館，幸而文物並未遭受太大損害。但隔年四月重新開放後，由於修築所需經費過於龐大，政經界又需應付災後重建及金融恐慌，此後的十餘年仍僅能運用表慶館來作為主要展示場地。然禍福倚伏，地震也帶來重建與轉型的契機，館方再次重新檢討經營及館藏方向。由於展

示空間暫時大幅縮減，過往以時代遞嬗為主的展示單元勢必有所更動，且為希冀可以專注於博物館事業，故最後決定將京都皇室博物館下賜予京都市，動物園頒賜予東京市。至 1924 年（大正 13 年），博物館的管轄範圍遂縮減至東京、奈良兩館與正倉院，館藏尚割捨自然史標本，1925 年（大正 14 年）8 月 15 日更廢除了天產課，美術博物館的性質更為明顯。但由於重新建設經費龐大，後以昭和天皇即位為契機，社會各界組織了「皇室博物館復興贊翼會」，紳商民合力奉納，搭配政府經費，終於 1938 年（昭和 13 年）新建完成了帝冠樣式建築的復興本館、別館及庭園，即今日遊客踏入東博後所見的氣派本館。

戰後，受到日本憲法改制的影響，博物館由宮內省交由文部省管轄，並更名國立博物館，脫離皇室統轄的身份，邁向公共化之路，並進行大規模改制，成為美術、歷史資料的保存、展示與研究的綜合型機關。1952 年（昭和 27 年），隨著奈良分館獨立為奈良國立博物館，位於上野的博物館也改名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東博除持續推出各式展覽、與日本各館進行文物交換外，並積極擴建，陸續新建了法隆寺寶物館、東洋館、資料館、平成館等館舍，充實展示與典藏空間。當中與臺灣文物展示最有關者，莫過於 1968 年（昭和 43 年）開館的東洋館。該館為地上三層，地下一樓的建築，為日本最大的亞洲美術專門館，網羅亞洲各地美術、工藝、民族文物為主，面向多元。展示內容包含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印度、西亞等國的佛像、雕刻、陶瓷、染織、繪畫、書籍、金屬器具等，地下 1 樓並陸續新增有 TNM & TOPPAN 博物館劇場等設施。如此多元的面向，更加穩固了東博在日本博物館界的代表地位，也象徵著轉向國立博物館後的逐步轉變（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

館藏臺灣原住民文物的來源

東博目前收藏品總數在 11 萬件⁴以上，內包含接近二千件臺灣漢人與含跨多個族群的原住民文物。其來源多樣，種類包含風俗圖畫、服飾、家具、武器、樂器、遊戲用具、船舶、漁具、農耕器具等等，項目豐富，是珍貴的海外臺灣文化資料庫。而東博為何會有來自臺灣的文物？其主要來源管道為各方的捐贈，且時期從則從明治初期橫跨至晚近皆有。當中來自學者與政商名流的餽贈者，時間點主要集中在日本領臺初期，這是因當時臺灣作為新領國土，吸引不少調查者前來，連帶在探查過程當中蒐集了相關器物。有如長野義虎(1897)、成田安輝(1897)、越智元雄(1898)等，其中數量較多者為曾在臺灣擔任東勢角撫墾署長的越智元雄，計有 44 組，約 60 件的文物；而 1896 年（明治 29 年）來臺調查的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所提供者亦達 27 組，約 40 件。另日本皇室也曾撥交少量的文物。

而東博臺灣文物構成主要者，係三方面的機構、事件與單一人士的大宗捐贈，分別為：（一）牡丹社事件的戰利品(1874)、（二）臺灣總督府的蒐集捐贈(1907)、（三）德川賴貞的捐贈(1927)。

（一）牡丹社事件的戰利品

1874 年（清同治 13 年、日明治 7 年）5 月，日本藉口三年前有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在航程中遭遇暴風，漂流至臺灣恆春半島東海岸的八瑤灣，後 54 名船員為當地排灣族高士佛社原住民所害，遂出兵臺灣。日軍除在戰役當中獲得原住民的武器，並侵入多個當地排灣族部落，於內取得若干生活器物以為戰利品。而當日原雙方進入交涉期階段，原住民另提供了鹿皮、上衣等物品，以為贈禮。

根據當時擔任臺灣蕃地事務局長官大隈重信(1838-1922)事後彙整的一張「蕃地事務局一覽表」，便總結彙整了此次臺灣出兵的相關資料，其中戰

⁴ 東博藏品所謂的「件」，有時並非僅是單獨一件，部分指涉的「件」係類似組的概念，同一編號項下可包含數件至數千件不等的文物。

利品的一欄包括了「分捕二十三」，記載所獲得的戰利品大致情況。內容為「五月二十二日：双溪口，十種。六月二日：牡丹社，十二種。六月二日：竹社口，一種。」另一個欄位「土蕃獻物一種」，內容則為「上硖社酋長所獻鹿皮二枚」。此外，領軍的西鄉從道(1843-1902)也於與原住民的談判接觸當中獲得若干餽贈。總計，牡丹社事件的戰利品種類包含服飾、生活用具（蓆、食器、食匙、勺子、杵、鉞、鑿、手鋤……）、武器（刀、弓、槍、火槍）、煙草等，數量計有 60 餘組件。

這些戰利品初始主要供明治天皇觀覽，由臺灣分批寄出，以為海外出兵的战功象徵。後經指示，先交由總負責出兵的陸軍省觀覽，後移轉至新成立的博覽會事務局轄下保管。這批戰利品日後就一直留存於博物館的系統內，並成為東博的典藏（蔡承豪，2019）。⁵



圖 1 〈明治七年臺灣討伐分捕品〉，1915 年出版的《歷史寫真》刊物內的牡丹社事件文物（圖片來源／《歷史寫真》⁶）

⁵ 在牡丹社事件當中，西鄉從道還有捕獲一隻「山貓」，並相其製作成標本，後捐贈予博物館。但此項目未見於現在的東博目錄裡面，或因其屬於自然標本，故已轉移至其他博物館保存。

⁶ 大正四年（西元 1915 年）四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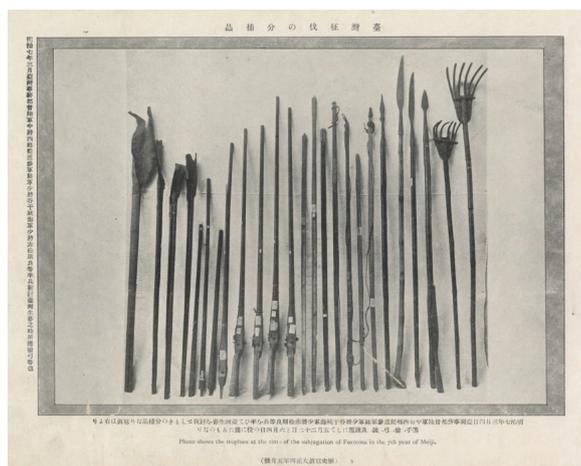


圖2 〈臺灣征伐の分捕品〉，
1915年出版的《歷史寫真》刊物內的牡丹社事件文物（圖片來源／《歷史寫真》⁷）

（二）臺灣總督府的蒐集捐贈

1895年（明治28年），日本領有臺灣，可直接掌控臺灣情況。而帝室博物館作為與日本與國外相關博物館、學術單位聯繫的窗口，即曾要求臺灣總督府代為拍攝原住民影像等事宜（臺灣日日新報，1899.2.16；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332）。

而為擴充館藏，以使參觀者更瞭解臺灣的情況，1905年（明治38年）2月，帝室博物館再度去函總督府，希冀其協助大規模且有系統地提供包括漢族、平埔族、高山族等各族群的服裝、住居、飲食、宗教、儀式、交通、音樂等各式臺灣風俗文物，以豐館藏。這種規模的請求，也代表帝室博物館欲更深化展示臺灣文化的面貌（臺灣日日新報，1907.4.24）。

帝室博物館並未明確指出要何種類型的臺灣文物，顯係交由總督府來

⁷ 大正四年（西元1915年）五月號。

進行規劃。而為規劃徵集的目標，總督府即商聘對於臺灣歷史、風俗甚為了解的學者伊能嘉矩(1867-1925)統籌其事。伊能嘉矩在 1895 年 11 月便以總督府囑託的身分來到臺灣，其後，除了對臺灣原住民進行深入的調查以外，伊能嘉矩也將目光投向島內的漢人社會及歷史，兼顧漢原二端的他，對於島內文化的樣貌掌握甚深。1903 年（明治 36 年）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臺灣館展示，即由他企劃整體展示內容。

但方向規劃完畢後，由於一時並無預算及臨時經費，延至 1906 年（明治 39 年）方開始進行徵集。從編列預算之舉來推測，總督府除了要求各地方官廳協助徵集之外，更有經費可以購買、新造所需物件。而最終透過大規模網羅後，總督府在 1907 年（明治 40 年）完成全部文物的運送，協助帝室博物館新增了千餘件的臺灣文物。在該次總督府捐贈的文物中，當中原住民文物佔較多數，約有四百一十五項是原住民的文物，七百個單件。而 1908 年，帝室博物館再度發函希望可以協助補充蒐集，不過項目主要在漢人的文物（蔡承豪，2017：77-78）。

（三）德川賴貞的捐贈

德川賴貞(1892-1954)，為紀州德川家第 16 代當主，明治維新後的華族（貴族）代表人物，係當時知名的音樂家、實業家與政治家。由於德川家的歷史淵源，他也是重要的文物收藏家。

紀州德川家的文物多元，但為維持龐大開銷，德川賴貞在 1920 年代不得不陸續進行若干文物的轉售以籌措經費，同時對於一些家內的典藏品進行處理。德川賴貞的父親，也是第 15 代的家主德川賴倫(1872-1925)相當熱心於文化事業，其 1902 年（明治 35 年）所成立藏書約有 10 萬冊的「南葵文庫」，便曾開放給一般大眾使用，建築在 1923 年關東大地震損毀後，更把大部分藏書捐予因地震引發火災而燒失藏書的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以為補充。德川賴倫並曾二度來臺(1901、1919)，第一次甚至還帶著攝影器材，

拍攝大溪一帶的「番界」景色（臺灣日日新報，1901.11.5）；第二次行程之一則為前往阿里山遊歷。二次來臺之旅，應有獲贈若干原住民文物，加上其他管道等的餽贈，其手上便擁有相當數量的臺灣文物。

1927年（昭和2年），當時為侯爵的德川賴貞，決定捐贈出將近二萬件的文物予東京皇室博物館。當中最多者為考古文物，另包含一千多件北海道、琉球、臺灣、朝鮮文物。臺灣的文物則有三百餘件，橫跨漢人與原住民等族群，並以後者為主。根據陳文玲在1995年的報告指出，當中原住民文物計有286件，類型多元，包括服裝、飾品武器、農具、生活器物、樂器、木偶等。

回顧前揭三批臺灣原住民文物的入藏時間與數量，並對照東博本身發展的歷史，於各階段皆具有獨特的意義。就牡丹社事件戰利品而言，其取得時間正逢日本公立博物館成立的探索期，制度、館藏仍處於變動期，且尚未領有臺灣。故該場意外的歷程，讓東博得以擁有當時尚屬難得一見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可謂具有相當的獨特性。而1907年間的入藏，正是博物館穩定發展的階段，為呈顯日本帝國統治概況，甚需補充臺灣文物以為充實，故主動尋求臺灣總督府的協助。而東博因關東大地震遭逢破壞，面臨重大挑戰，步入轉型期，德川賴貞的文物適時補充，也為該館的臺灣館藏注入增添新的元素。

表1 東博發展概況與取得臺灣文物時程對照表（製表／作者）

取得臺灣文物概況	年代	東博發展概況
	1871	5月，於東京招魂社大祭之際，一同舉辦「物產會」。
	1872	於湯島聖堂舉行日本首次大型博覽會 設立博覽會事務局
日本出兵臺灣（牡丹社事件），日方取得 60餘組件戰利品	1874	
	1881	上野「博物館」正式開館
	1886	宮內省「博物館」成立
	1889	博物館改名「帝國博物館」
若干臺灣文物陸續流向博物館	1895	取得臺灣殖民統治權
	1900	帝國博物館更名為「東京帝室博物館」
臺灣總督府協助蒐集臺灣原住民文物約 415項，700多個單件。	1907	
	1923	因關東大地震，帝室博物館失去大半館舍， 後僅能暫時利用表慶館展覽。
德川賴貞捐贈286件臺灣原住民文物	1927	
	1938	帝室博物館復興本館落成

帝國櫥窗：巡迴展與常設展

在陸續接獲得臺灣原住民文物之後，在不同階段，這些器物也以不同的方式陸續展陳，成為日本新興帝國用以宣傳其海外擴張與統治實跡的見證。

（一）博覽會巡迴

在牡丹社事件的時期，正是明治政府在觀覽萬國博覽會後，認知到藉由展覽契機的互相競爭、促使彼此成長的優點（金山喜昭，2001：67-68）。故為推動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積極推動殖產興業政策，而著手將「萬國」博覽會的概念，轉換為日本國內的勸業博覽會，以讓各地物產同場競爭，並宣揚新知識、新商品與新技術。明治初期政府核心人物將博覽會視為保護國內產業並企圖打開日貨在國際市場通路的商戰策略思維，而與歐洲舉辦博覽

會以開自由貿易的想法截然不同。大久保所提出的「內國」概念與名稱，在往後三十餘年間中央政府舉辦的博覽會中，一直延續下來（呂紹理，2011：80）。

從 1868 年（明治元年）明治維新開始，到 1877 年（明治 10 年）舉行第一次內國勸業博覽會這段期間為止，日本除了赴國外參加展覽外，國內地方人士也極為熱心舉辦以「博覽會」為名的展示活動，估計到 1877 年為止，共舉辦了 41 次「博覽會」。如京都地方商人三井八郎右衛門、小野善助和熊谷久右衛門等人，於 1872 年 10 月 10 日在京都西本願寺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京都博覽會」，「廣蒐天產名物、蒐集人造妙品」於一堂；而同年舉辦博覽會的還有和歌山、岡崎、土浦、高知等地。1873 年（明治 6 年）於茨城、福岡、松本、島根舉辦，1874 年（明治 7 年）則是在名古屋、新瀉、金澤等地舉辦。而後，日本各地更持續有大小不一的地方博覽會接二連三開辦（永山定富，1937：31-33；並松信久，2016：287）。

這股熱潮，除了展示新商品外，另也因為太政官於 1871 年（明治 4 年）5 月公布「古器舊物保存布告」有關，此布告係為保護在文明開化趨勢下可能被急於棄舊者加以破壞的古物；而各地也開始調查與保護古器物，博覽會並作為普及民眾關於古器舊物的歷史與文化價值的裝置而運作（金山喜昭，2001：109）。在展覽風尚下，來自海外的臺灣戰利品，也成為部分博覽會所欲增添異國風情的海外文物。因在牡丹社事件期間，《東京日日新聞》的編輯岸田吟香跟隨征臺軍隊進行採訪報導，將這場日本最初的海外戰爭的實況迅速傳達給日本國內的讀者，尤其是關於戰鬥的情況，及日人不熟習、帶有神秘、原始色彩的臺灣原住民部分等。而在將近半年的報導下，讓臺灣的風土民情及原住民的風俗習慣一時知名度大開。故若臺灣文物得以出現在博覽會內，相信可以收到不少的宣傳效果。

故牡丹社事件的戰利品在供明治天皇觀覽後，陸軍省獲指示後，即陸續移轉給博覽會事務局。1874 年 9 月 24 日，博覽會事務局收到第二次的戰利品五箱。隨後，這些物件即在該博覽會所轄的展覽館內展示，成為

臺灣原住民文物第一次在日本公開的展示。就當時的情境來判斷，應是作為宣揚日本海外揚威的佐證而展示。

由於這批臺灣原住民文物知名度甚高，故有多個地方在得知此訊息後，遂向博覽會事務局及日後的博物館單位請求商借若干器物。使原住民文物跨出本州，而於日本各地的博覽會之中露臉。當中包括：1. 太宰府博覽會(1874)，2. 第一回奈良博覽會(1875)，3. 第五屆京都府博覽會(1875)，4. 明治九年宮城縣博覽會(1876)，5. 琴平山博覽會(1879)等。或由主辦單位自身，或由當地地方政府協助，發函予博覽會事務局商借原住民文物（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2004：516-518、528-546、578）。

分析各單位商借之目的，主要係為使展覽內容得更豐富。如第一回奈良博覽會向事務局商借範圍，主要是蝦夷、中國、朝鮮、臺灣等地的武器、生活物品，當中包含臺灣人使用的蓆（草根製ノタハシ）、鍬炮袋、靴、刀、箭（矢）、照片（寫真）、玉藥入袋，以及在臺灣（雙）溪口獲得的鎗、臺灣原住民手中得到的熊手、靴拂等 9 件。第五屆京都府博覽會則強調係為讓觀眾可以耳目一新，希冀可以商借臺灣的文物、武器等。琴平山博覽會內，則商借了笹穗槍、槍、弓箭、鐵炮、刀、石杵等物，並標示為「臺灣國製」物件（蔡承豪，2019）。

出兵臺灣事件對當時的日本而言自是一重大指標性事件，日本除在談判桌上獲得成果外，戰爭中所擷取之臺灣原住民文物更是事件的直接見證。故前述博覽會，多半要求武器類的文物以作展示，原因甚為明顯。另作為難得一見的異國文物象徵，更可讓日籍觀者可以遙想位於臺灣南端熱帶山林內排灣族人的生活樣貌，引發某種新鮮感。在揚威與獵奇之間，臺灣原住民文物在明治初期，成為展示時難得的象徵物品。

（二）東博內的常設展與特展

隨著 19 世紀末以降，東博的組織、館舍的日趨穩固發展，及在國內博

物館界中心地位之確立，其常設展的內容亦成為該國建構自身國家文化認同，與表徵國家文化價值的重要場域，藉由單元的規劃與經被挑選的文物，以傳遞上述之意義。

1. 常設展

在帝國（室）博物館階段，常設展分為歷史部、美術部、美術工藝部、天產部等四部分。當中歷史部以呈現日本文化為主，並兼及若干海外地區之風俗為主。但正逢 1895 年臺灣被納入日本殖民版圖內，此事可謂是當時國際注目的焦點，對日本而言，取得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更是意義重大。故相關變動，連帶反映在東博歷史部的展區規劃上。1902 年（明治 35 年），歷史部內的展設區分進行更動，與過往相較，最主要的改變除在於將「發掘品」改為「上古遺物」，新設「奈良時代遺物」與「服飾」之外，特別值得注意者係將原先的「各地風俗」，區分成「蝦夷琉球臺灣風俗」（之後並加上朝鮮）與「外國風俗」兩個專區（東京国立博物館，1973：318-319）。

這樣的變革，正呼應著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勢擴張情況。由於日本逐步跨出原有領域，逐步將琉球（今「沖繩」舊稱）、蝦夷（今「北海道」舊稱）、臺灣、朝鮮納入版圖當中，故帝室博物館在規劃常設展示內介紹日本的歷史文化的各單元中，也隨之調整以「國內—殖民地—外國」的脈絡進行區分。在介紹本國文化（一至十區）與外國風俗（第十二區）之間，將殖民地的文化介紹至之於「內、外」兩者中間，宛如一個帝國權力擴張的過渡地帶，添設專區以呈現非屬日本原有區域的歷史文化與民族特性，可謂頗具有宣示國家勢力拓展概況的意味。

表 2 1902 年帝室博物館歷史部各區展示單元（製表／作者）

分區	展示項目	分區	展示項目
第一區	典籍、文書、圖畫、金石文、版木	第七區	儀式、家什
第二區	上古遺物	第八區	樂器、遊戲具、文房具
第三區	奈良時代遺物	第九區	貨幣、印紙、度量衡
第四區	祭祀宗教相關物品	第十區	輿車、船舶、建築
第五區	武器	第十一區	蝦夷、琉球、臺灣風俗
第六區	服飾	第十二區	外國風俗

資料來源：東京国立博物館，1973：318。

當時的帝室博物館建築與現今不同，因舊有建築群除表慶館以外，大多毀於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故難以與現在的建築樣式比對。但根據 1899 年（明治 32 年）的陳列圖仍可知其原始的位置可發現，當時陳列臺灣相關文物一號館之一樓左側的第八室，這一側皆是歷史部的陳列室（一樓右側則屬於天產部）。進入一號館大廳後，可由後排展場通道進入第八室觀覽，後接展示外國風俗的第九室，亦可進入前方展示典籍、文書、圖畫、金石文、版木的歷史部第十四室。將殖民地展示置於這樣的安排，可謂相當微妙。爾後即便隨著表慶館的落成，美術及美術工藝類的陳列移往該館，天產部也隨之更動，加以日韓合併等大環境因素，歷史部在 1918 年（大正 7 年）進行大規模的展區調整，調整為第六室為朝鮮、中國古代遺物，第七室為中國古代遺物，第九室為外國風俗，朝鮮風俗則單獨被規劃於第十室；但臺灣展區的位置並未隨之變動，並維持至 1923 年為止（東京国立博物館，1973：345）。

在日本領臺後，於「蝦夷、琉球、臺灣風俗」的陳列室內，便自然安排展出若干臺灣原住民文物，以 1902 年（明治 35 年）的展陳為例，即展出臺灣人的環，臺灣原住民的槍三支、刀一把、弓二挺、弓箭二支、火槍二挺，以及原住民照片一張等（東京国立博物館，1973：337）。另根據一位於 1907 年前往東博參訪、筆名為「神州生」的人士表示，由於總督府提供的文物尚未完全規劃完成，故其參觀了舊有的臺灣陳列室。其內主要有三個展櫃，第一櫃陳列武器、衣服、雜項等，第二櫃為裝飾品、攜帶品、

遊戲器具等。此二櫃則主要來自於幾個主要的捐贈者，除包括牡丹社事件的戰利品，另有前述長野義虎、越智元雄、成田安輝，以及曾擔任臺灣蕃地事務局長官的大隈重信於 1893 年（明治 26 年）所捐贈 6 筆原住民文物。而第三櫃的文物，則是來自於日本二位外籍顧問所提供的原住民物件，包括武器、衣服、裝飾品、攜帶品、遊戲器具、雜項等。這些展示品，共同構成了臺灣區的陳列。

從展示文物的類型來看，原住民武器是必要出現者，畢竟武器所代表的性質，正可呼應作為明治維新後海外首度出兵之見證。加以在總督府撥交大批文物給東博前，典藏臺灣文物數量尚不足百件，且並未如現在制訂有機材質需定時輪替的情況下，牡丹社事件的文物應就是當時東博對於臺灣原住民展示少數得以運用的資源。不過至 1907 年的展覽，已陸續加入了在領臺前後經由別的管道所獲贈的新原住民文物，以使展示更為豐富。至於漢人文物，則未有出現的空間。

然隨著臺灣總督府撥交且有系統分類，且數量豐富的臺灣文物後，東博擁有較豐富的文物得以進行展示選用。臺灣總督府更並於 1907 年 3 月，派遣負責文物徵集規劃的伊能嘉矩，前往東京協助東博撰寫文物及展示說明（臺灣日日新報，1907.6.13）。而臺灣展區位置雖未更動，但展示內容則得以更為豐富，並在同年 4 月 5 日增設臺灣漢人文物，已非僅侷限於原住民物品。

另如根據一位長期在臺灣擔任教職的藤下理周表示，由於他在 1907 至 1916 年期間都在臺中豐原、潭子一帶任教，故對於當地平埔族潘家的歷史、文物皆甚為瞭解。其知悉潘家原掛有二幅畫像，其中之一為知名先祖潘阿敦（又稱潘敦仔）的代表性官服畫，爾後，此二幅轉移至臺北的總督府博物館。但 1917 年（大正 6 年）他前往上野的東博參觀之際，訝異地居然發現此二幅畫已經移轉至該館了（藤下理周，1933：75）。從藤下理周的參訪，可得知該館臺灣原住民展示的一個案例，係以展出平埔族原住民家族內具代表性的物品為象徵，多少可看出轉向介紹臺灣原住民自身傳統文化的改變。惟他

所不知道的是，東博所展出的潘家畫像並非原件，而是在數年前徵集行動之際由總督府另為之臨摹所贈予東博者。但可能因為製作的相當精緻，故被誤認為原畫作業已從臺北轉居至東京了。

2. 特展

當獲得總督府的奧援之際，東博隨即在 1907 年規劃於一號館旁的三號館二樓展廳舉辦臺灣文物特展。而臺灣總督府同是慎重，由已於同年 3 月至東京的伊能嘉矩協助規劃，以供配合預定 6 月開展的期程（臺灣日日新報，1907.6.13）。

根據東博及策展人伊能嘉矩的構想，希望此次的公開展覽，可以讓民眾了解臺灣這塊新領土的概況，並給予該國人類學研究若干便利之處。而可能鑑於過往未曾展覽過臺灣漢人文物，故此次的特展，係以漢人風俗為主，展件來自於總督府所提供包括服裝、住居、飲食、宗教、儀式、交通、音樂等各式臺灣風俗文物內進行挑選（伊能嘉矩，1907：400-401；讀賣新聞，1907.6.22）。此特展雖未展示原住民文物，但仍可呼應原有常設展內的臺灣展覽，共同構築博物館的臺灣意象。

3. 展覽的縮減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後，由於帝室博物館的館舍大量受損，僅能集中至表慶館展覽，迫使原有的展示項目必須縮減。天產部的展件遂不再展示並移轉予他館，改以美術、美術工藝及歷史類的陳列為主。歷史類的陳列空間自然被大幅壓縮，連帶完全捨棄了臺灣文物的展出，僅展陳日本歷史文物及若干中國考古出土文物。

至 1938 年復興本館落成，東博對展陳方向重新進行規劃，轉以美術及工藝為主。25 個陳列室當中，便有 11 個為繪畫、雕刻區，其餘則展示書法、漆工、染織、金工、考古等，由原來的歷史、美術、美術工藝三足鼎立，轉向以美術為中心的展示策略，並在戰時的氛圍下強化日本文化的發揚。在此

種情況下，即便有德川賴貞的挹注，臺灣文物卻已幾無機會可以出場。

（三）作為帝國的櫥窗

就收藏之生命史的來看，可以看到在不同時期對不同性質藏品有著不同形式的強調。最早為博物館使用的知識，可說是由殖民帝國派遣人員到遠方採集、搬運回國後經由分類、建檔而得來的資料，此類知識則供予殖民勢力運用。這類藏品蒐集與知識生產的方式，藉由主體性與權力的關係，顯露長期以來原住民部落社群在知識建構累積發表上的不對等關係（林頌恩，2012）。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的觀點的指出，這些展示形式所能夠「看見」的，都是一種權力機制下的殖民產物，是一種「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歷程，特別是在殖民者高舉「文明」大旗進行殖民統治的情況下。如日本參與的殖民博覽會，便常成為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採集和圖像被挪用的場域。而文物入藏博物館後，對於該些物品重新給予編碼，亦是一種權力的呈現。（胡家瑜，2005、2006）

回顧戰前臺灣原住民在東博內的展示，即在如此情境下成為殖民統治者運用的管道之一，用以對比所謂原始與文明進化間的差異。東博經由展示特定挑選的文物種類，讓尚未見識到臺灣實際樣貌的觀眾，藉由數個展櫃以瞭解新領地所具有的文化特徵與習性，而官方亦同樣藉由展示途徑，彰顯握有新領地的權力姿態。此批陳列物品於此一時空之下所呈現的定位，對日方來說形同「他者」領域的觀看，雖然日本與臺灣處於同一治理權力的架構下，但在治理臺灣的初期階段，仍有待時間、空間，與能力的考驗。東博雖將此批文物歸屬在歷史部門之下，但文物本身所傳遞與表達的訊息，並非是歷史分期的品物象徵，反較像是特定地方風俗文化的特展（尤啟任，2011：72）。如於牡丹社事件中獲取的武器，長期作為展示品，即凸顯帝國勢力擴張的象徵。

博物館既在殖民帝國中，做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自然難脫政治的關

連。在這樣的歷程下，原住民展示逐漸成為殖民統治者運用，以作為對比呈現原始與文明的媒介（李子寧，1997）。錢曉珊比較三個日本殖民地博物館後指出，博物館為一種社會文化的產物、社會文化現象的反映，從不同層面求得對文化與文化再現的瞭解。殖民者企圖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隱藏在知識殿堂之下，且當殖民者面對不同的殖民地與被殖民者，殖民者更所使用不同的他者再現手法。殖民者透過博物館再現特定的「他者」，是因為掌握「他者」意味著掌握其「過去」，如此得以解釋「現在」。在殖民地博物館中，「他者」與「過去」是可以替代的（錢曉珊，2006）。

東博雖非專以呈現殖民成果的博物館，但至 1923 年前，特別規劃一區展出臺灣原住民文物，其精神亦可謂甚為雷同。牡丹社事件的物件數量或然有限，卻是該事件及排灣族原住民物質文化的重要見證，並可視為日本認識與呈現「他者」的起點。雖對於臺灣而言，非是第一次民族文物的外流⁸，但 1874 年取得文物，正可資作為一個日本認識臺灣的先遣嘗試對照，且隨著日後文物來源的更趨豐富，作為殖民地內少數民族的呈現方式或也被持續強化。然不可忽略的是，由於擁有更多元的文物，固然原住民無法在博物館內取得話語權，且在呈顯殖民統治及與其他展廳呈現多樣且質精的日本歷史相較，或可能被凸顯的是一種落後的意象，不過藉由物件的陳列以及說明，原住民自身的歷史與物質文化卻也獲得在日本代表性博物館內些許的露出契機，對於部分對臺日交流間有一定認識的人士而言，則應該是一種驚奇。

重新構思下的「南島」觀點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東博的體制進行重大變革，由皇室轄下的大博物館轉為國家行政體制下管轄，成為「國立」博物館。現今則為「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博物館」旗下的一館。

⁸ 在 17 世紀，已有日本商人安排臺南的平埔族人前往日本。而晚清來臺的探險家，亦採集了諸多自然標本與人文器物，以做知識蒐集及詮釋之用。

臺灣在戰後脫離日本，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由於政治環境的改變，殖民地的展示項目在政治正確的考量下自不宜於東博內出現，連帶使在 1923 年以降已少出現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大規模曝光的契機更為渺茫。在東博的原住民物質文化遺產，多年來便默默地塵封在異國庫房而少為大眾所知悉。

(一) 大規模整修前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展示

但隨著 1968 年本館旁的東洋館落成開放，則有了轉機。東洋館這個日本最大的亞洲美術專門館，由知名的建築家谷口吉郎(1904-1979)⁹所設計建造，該館如同其名稱，所設定的展覽方向係以網羅、呈現亞洲各地美術、工藝、民族文物為主。這樣的展陳方向除了補充本館僅以日本美術為主的不足，讓東博具有更多元的面向外，更是讓館藏當中諸多亞洲藝術文物得以有展示的空間與契機（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761）。筆者赴東博訪查之際，根據該館的研究人員表示，在東洋館開館後，長期間會至少安排一件臺灣原住民文物以作展出。雖規模相當有限，但在東洋館的主題下可謂甚為合適。

而東洋館的展覽當中，也不乏舉辦過臺灣文物特展。如在 1998~1999 年期間，為慶祝東洋館開幕 30 年之際，東博規劃了一系列的紀念特展，當中更安排了「台灣先住民の工芸」特展在當時的第三室內展出。展期安排於 1999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14 日；意即時隔 76 年，東博再度大規模展示了臺灣原住民文物。此次展出，就其展覽簡介內絲毫未提及過往殖民的成果，而是以臺灣原住民的農耕、狩獵、漁獵生活，及文化、語言、習俗等為主。這種轉變可看出隨著國際政治大環境的改變，在日本國內的博物館自不可能再以殖民呈現為出發點來詮釋臺灣原住民文物。而展覽共計展出 116 組，約 130 件的文物；而由東博的東洋課所編纂的展覽特集¹⁰當中，逐一羅列出此次展覽的品名、件數、所屬民族、年代，以及捐贈者。可觀當中超過半數是

⁹ 知名作品包括東宮御所、帝國劇場、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沖繩戰沒者慰靈碑等。

¹⁰ 該特集係以黑白印刷釘裝而成，包含展覽之展名、展期、日英文簡介、展件清單，雖編有頁碼，但似非正式對外發售的出版品。

來自於臺灣總督府，約四分之一則為德川賴貞所捐贈。而此一時期，並未避諱標示出部分文物係由「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所捐贈，與晚近的展覽樣貌不同。

（二）現今的展示樣貌

後為進行耐震整修工程，東洋館自 2009 年起暫時休館，至 2013 年 1 月重新開放。除了提升耐震度，使用低反射玻璃展櫃、LED 照明設備取代螢光燈管外，內部的展示空間也因重新調整而擴大，大幅提高了展場空間的展覽效能，從原來的 10 個展示廳，拓展為 13 個陳列室。東洋館地下一樓設置了第 11、12、13 陳列區，以及博物館劇場。除劇場外，陳列區皆採行半開放的展示空間，其中第 13 室係規劃以「アジアの民族文化」（亞洲的民族文化）為主題展示，內區分為三個小區域，分別介紹印度（13-1 室）、東南亞島嶼地區（13-2 室），以及南太平洋地區（13-3 室）等地之民族文化。¹¹

13-3 陳列室位在地下一樓文物展示區的最後端，其後連接博物館劇場，該子區的展示重點係置於分布於南太平洋地區的南島語族文化。該族群的分布範圍包括北至臺灣，包含海南島、越南南部、菲律賓、馬來群島等地，東達南美洲西方的復活節島，西至東非洲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南抵紐西蘭的廣大地域，總人口約有 2.7 億，是擁有獨特海洋文化的族群，甚為值得展覽呈現。除展出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等地區의 文物外，館藏既有同屬南島語族的臺灣原住民文物，自也成為研究人員瞄準的目標。

此外，東博內部亦持續推動「東洋民族資料に関する調査研究」（東洋民族資料的調查研究）計畫，由學藝員對該館的東洋民族文物進行長時期的研究整理，並隨研究陸續有成後，即運用「アジアの民族文化」的主題進行展示。自 2015 年起，東博的研究人員開始規劃於「アジアの民族文化」展

¹¹ 但此三個展區偶而也會進行合併展示使用，並非固定同時間區分成三個子單元分別做展示。

覽內規劃臺灣原住民專區，自 2016 年 1 月開始正式展出，展示內容則如表 3 所示。

表 3 東博東洋館「アジアの民族文化」臺灣原住民單元展示時程表（製表／作者）

展示主題	日期	件數
台湾パイワン族の木彫	2016年1月13日～2016年4月10日	7
台湾の海の民—タオ族の伝統文化—	2016年4月15日～2016年7月6日	7
台湾パイワン族の木彫	2017年1月17日～2017年4月16日	7
台湾の海の民—タオ族の伝統文化—	2017年4月18日～2017年6月25日	7
台湾パイワン族の木彫	2018年1月30日～2018年4月22日	7
台湾の海の民—タオ族の伝統文化—	2018年4月24日～2018年7月16日	7
台湾パイワン族の木彫	2019年2月5日～2019年4月21日	7

從上表可得知，根據東博的規劃，展示主題主要有二，分別為「台湾パイワン族の木彫」（臺灣排灣族的木雕），以及「台湾の海の民—タオ族の伝統文化—」（臺灣的海洋民族—達悟族的傳統文化）。由於是有機材質，展示原則上以三個月為一個檔期，兩個主題輪替，二者展出共六個月，安排於各年度的上半年。使用的櫃體為五面體玻璃罩突出牆面之懸空展櫃，總長約 3 公尺，展櫃旁置有展覽說明圖版，以作為展覽的起始介紹，各文物並輔有品名卡及陳列支架；不過可能囿於展櫃空間，並未另搭配局部放大圖或原住民老照片等。現場文字圖版語言包括日文、英文、簡體中文及韓文，可觀該館所設定的主要客群來源，惟展櫃內針對展件的小說明僅有日文。

由於東博的展示方式，偏向於呈現文物本身特質的古美術館手法，並無太多搭配的造景及解說，「アジアの民族文化」一展亦無發行導覽手冊等。故現場的展覽簡介，以及搭配展件的小說明，便成為觀眾理解這些物件的主要輔助說明。

《臺灣排灣族的木雕》之展覽旨趣，由於未及在現場觀看此展，故根據東博官方網站的展覽介紹，係內容系為：

在臺灣南部生活的排灣族，其從日用器物到祭祀儀禮用品等等，皆是使用木材製作。在此，所介紹者為以鑲嵌金屬、貝殼為代表的精緻木雕技術，及呈現排灣族木雕特徵的設計——如據說被咬了之後走一百步內就會死亡的百步蛇之紋樣等。

而關於《臺灣的海洋民族—達悟族的傳統文化》展，位於展廳內、字數較官網為多的單元說明則介紹：

臺灣本島的東南外海有一座稱為蘭嶼（紅頭嶼）的小島。生活在島上的達悟（雅美）族據說是從菲律賓的北部飄洋過海來到此地的。達悟人悉心守護的文化當中，有從先祖繼承的傳統世代相傳。例如蘭嶼的漁村現存的貢多拉型船中有象徵先祖形象的紋樣裝飾，像這樣的船主要用於捕撈被達悟族信仰為神魚的飛魚之用。對於達悟族而言，大海不單是漁場，更為重要的是神靈賜與恩惠的神聖場所。（希望觀眾）通過展覽親身感受在孤島上與大海共生的達悟族的祈禱和智慧。¹²

前述兩個展覽簡介的書寫方式，皆先是介紹族群的分布地，再介紹此次展出文物的特性與呈顯重點文物。就此觀之，其介紹重心基本上是置於對被展出者的文化特質，而在展櫃內的展件說明也是針對文物本身的材質、用途等進行民族學式的描述，將之以大洋洲內重要的民族—南島語族的文化特色來進行呈顯，並未涉及國家權力的展現。整體而言，與東洋館的整體大展示調性可謂吻合。但這樣的詮釋安排在若干處卻仍值得討論，如蘭嶼的拼板舟與威尼斯的貢多拉外觀雖略有近似，此種說明類比，可能是為了讓不熟悉臺灣原住民的日本觀眾而所作的比擬，但卻容易帶來誤解。

就選件來觀察，二展所選陳的文物皆是各七組件，詳細清單如表 4、5 所示。排灣族的部分包括椅子、杯子、木枕，以及三把配刀。當中配刀原係

¹² 於現場的單元說明，內容較網站說明為豐富，並有中文翻譯，文中便以此較長的說明文字為探討。

為武器，但三者的木質刀柄、刀鞘上，皆有相當華麗的雕刻與金屬、貝殼鑲嵌，正可作為象徵木雕藝術的見證。而達悟族所選展者，則包括與海相關的船模型，婦女的銀製手環、胸飾，男子的頭盔及盔甲等，串珠胸飾及銀製手環，並以斜版做立體展示，相當適切的傳遞了海的子民之意向，並彰顯達悟族的衣飾民族特色。

表 4 《臺灣排灣族的木雕》展件一覽表（製表／作者）

文物名稱	件數	來源	時代	編號、寄贈者
木雕人面椅*	1	臺灣·屏東縣	19 世紀後半~20 世紀初	TK-566
單杯	1	臺灣·屏東縣春日鄉	同上	TK-255
連杯*	1	臺灣·屏東縣瑪家鄉	同上	TK-256
木枕	1	臺灣·屏東縣春日鄉	同上	TK-260
佩刀	1	臺灣南部	同上	TK-529
佩刀	1	臺灣南部	同上	TK-3361
佩刀*	1	臺灣南部	同上	TK-3364
資料來源：東博網站				
說明：加註*者，為東博網站標明的推薦觀覽品，但並非每一次的展示網站介紹都會標註				

表 5 《臺灣的海洋民族：達悟族的傳統文化》展件一覽表（製表／作者）

文物名稱	件數	來源	時代	編號、寄贈者
船模型*	1	臺灣·臺東縣蘭嶼	19 世紀後半~20 世紀初	TK-651
土製船*	4	臺灣·臺東縣蘭嶼	同上	TK-650
付柄方形木皿	1	臺灣·臺東縣蘭嶼	同上	TK-641
銀製手環	1	臺灣·臺東縣蘭嶼	同上	TK-614
胸飾*	1	臺灣·臺東縣蘭嶼	同上	TK-617
頭盔	1	臺灣·達悟族（雅美族）	同上	TK-3345 大和岩太郎氏寄贈
盔甲*	1	臺灣·達悟族（雅美族）	同上	TK-3344 大和岩太郎氏寄贈
資料來源：東博網站				
說明：加註*者，為東博網站標明的推薦觀覽品，但並非每一次的展示網站介紹都會標註				

上述展件自何而來？就公開的說明觀之，僅有 TK-3344、TK-3345 二件標明為大和岩太郎所贈，其餘並無說明。在現今東博展覽的品名卡當中，典

藏編號係以「英文 - 數字」搭配標示方式，並會標示出捐贈者姓名。TK 在東博的編號系統中，係屬於東洋民族文物的起始標號，大體而言，編號越少者，入藏年代越早。若根據目錄追溯各文物之來源，除 TK-3361、TK-3364 二件，其他文物皆是來自於 1907 年臺灣總督府的捐贈，但在品名卡及展覽網頁上，皆無特別標示。或許是為了避免過多的聯想，也可能僅是依循一般博物館的常規而已。卻不難讓人揣想該館或策展人有某種程度的考量，隱約呈顯了國際政治社會變遷下的氛圍。

於東洋館內的臺灣原住民展示單元，今年仍持續著，且東博內部關於臺灣文物在內的南島語族文物的研究亦仍持續進行。該館的研究者積極訪查日本國內各館，並曾前來臺灣進行原住民文物的調查與文化交流。從展示主題及內容來觀之，原住民文物係被放在走向世界的南島語族架構中呈現，已與戰前有甚大的差異。這樣的展陳與研究，也反映著對於舊藏品的重新認識，並讓各地參觀者得以有新契機在日本境內觀覽、瞭解臺灣原住民文物的樣貌及精髓。但根據策展人員表示，會擇定前述二族為中心，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該館並無專職於臺灣原住民文物的研究人員，故在選取上便以較易辨識的排灣族與達悟族為展示，多少反映出該館在這個領域的窘迫。但在臺日沒有邦交的情況下，於日本國內最重要的公立博物館內如此持續展出臺灣原住民文物，或也有某一種代表含意吧。

而就展示趨勢而言，多元族群與文化已成為現今國家博物館的主流價值觀，以國家博物館或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或其更新來看，轉向以多元族群／文化的概念作為展示敘事的觀點成為博物館這個文化接觸地帶不得不的努力方向。就東博的臺灣原住民展示觀察，亦似可觀察出這樣的變遷。



圖3 東博東洋館地下一樓展區概況圖
(攝影/作者)



圖4 第13陳列室展示全貌
(攝影/作者)



圖5 「台湾の海の民-タオ族の伝統文化-」展櫃及文物樣貌 (攝影/作者)



圖6 「台湾の海の民-タオ族の伝統文化-」展櫃及文物樣貌 (攝影/作者)



圖7 東博所藏排灣族配刀景況 (TK-3364) 13 (攝影/東京国立博物館)

結語

博物館透過空間安排，保存了各式記憶，並搜集各樣有形或無形的自然及文化遺產，再藉由典藏、展示與教育活動予以鋪陳、轉化及呈現。但過往，博物館常被視為殖民治理的體現機制之一，然隨著近年族群展示中對於相關議題的多元包容與相互尊重之重視，也讓擁有民族學文物的各博物館重新去面對與思索其所呈現的方向與內涵。尤其國家級博物館的展示，可視為該國某種宣示性面向的櫥窗，其成立與展示內容自甚受國家政策的影響。本文即透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官方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中的臺灣原住民展示，以貫時性的觀察，探討該館對於少數民族詮釋的流變及其背後意義。

博物館是不同人群的接觸地帶，就收藏之生命史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在不同時期對不同性質藏品有著不同形式的強調。原住民展示並逐漸成為殖民統治者運用的管道之一，用以對比呈現原始與所謂文明進化發展間的差異。臺日之間地理位置相近，本就有諸多的歷史淵源，尤其臺灣更有半個世紀的時期作為日本殖民地。而美麗之島曾是提供殖民統治者無限想像的地方，關心的焦點多半集中於原住民，因為有少數民族的存在，使臺灣這個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更接近西方帝國高舉進步主義下所治理的殖民地，無形

¹³ 檢自：<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index>（瀏覽日期：2018年8月27日）

中也使日本自覺能與西方列強並列。

作為日本代表性博物館的東博，其發展變遷與該國明治維新以降的政治環境變遷息息相關，從博覽會的臨時單位，到正式的博物館機構，後又成為皇室博物館，至戰後則轉為公立博物館的身份。而臺灣原住民文物先是在領臺之前的 1874 年便已進入東博前身，1895 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該館更因此得以大量且系統性的獲得原住民文物；但 1945 年以降，臺日二者間又割裂成為互不隸屬的關係。種種複雜的政治環境變遷，連帶呈顯於東博的原住民展示內容上。

從 1874 年起，東博以出借牡丹社事件取得的原住民文物予日本各地博覽會的方式，讓這些戰利品成為彰顯海外戰果及增添異國風味的映證。待博物館館舍正式創建後，這批文物仍是作為外地風俗、甚至於殖民地風俗的主要選展文物，繼續充作國力擴張的見證。至 1907 年，來自臺灣總督府的捐贈充實了原住民類文物，使得對於原住民文化的介紹得以有若干轉變及深化，但仍主要作為帝國的展示櫥窗。

東博經由展示文物的種類，讓無法親自見識臺灣樣貌的民眾，藉此瞭解新領地所具有的文化特徵與習性，而官方亦同樣藉由展示途徑，彰顯握有新領地的權力姿態，此批陳列物品於此一時空之下所呈現的定位，對日方來說形同「他者」領域的觀看，雖然日本與臺灣處於同一治理權力的架構下，但在治理臺灣的初期階段，仍有待時間、空間，與能力的考驗。東博雖將此批文物歸屬在歷史部門之下，但文物本身所傳遞與表達的訊息，並非是歷史分期的品物象徵，反較像是特定地方風俗文化的特展。為了滿足想像，真實的面貌有時就被忽略或扭曲了。

至關東大地震後，因展區的縮減，以及重建後展示方向的轉變，臺灣原住民文物展示的機會大幅萎縮，戰後更因政治大環境的變遷，原住民文物不僅不再做為殖民的象徵，連帶曝光程度一度幾無空間。但隨著東洋館的建立，原住民文物得以有少量展出的機會，近年更在館內的研究成果及南島民

族文化的展示主題下有較固定的小規模展覽，展示方向並脫離政治語言，轉向以在南島民族的觀點來介紹臺灣原住民文化。然囿於該館並無專業此一領域的研究人員，能展陳者目前僅侷限於排灣、達悟二族的少量文物。

博物館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記憶所繫之所，晚近博物館學的思維轉變，與新博物館型態（如生態博物館）的出現，也似乎讓博物館所「掌管」的記憶可以不只限於服務國族政治的權威藏品，並轉譯來自各方的聲音。但博物館亦常被視為殖民治理的體現機制之一，涉及了細膩的殖民治理手段，比如將人群作為研究客體，透過分類及展示，遮蔽在演化論下，建立高下尊卑的種族論述等等。而博物館是民眾認識臺灣原住民的重要場域，尤其在海外難以直接面對原住民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過往的展示，對於現今的博物館而言可能是一段難以言說及面對的歷史，由於展示主題的選取、政治大環境氛圍的變遷……等種種因素，散佚在海外博物館的原住民物質文化遺產，多年來被賦予詮釋國家形象的象徵物件，後又默默地被塵封在異國庫房而少為大眾所知悉。然透過新的契機，其終得以截然不同的面貌重現於世人面前。在臺日沒有邦交的情況下，於日本國內最重要的國立博物館內如此持續放置在南島語族的大架構下展出臺灣原住民文物，並搭配中性的人類學解說模式，仍具相當的象徵含意。

解殖或許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但也需要一個應許的社會氛圍。臺灣原住民文物在東博的再現，與該國政治氛圍及國際環境的轉變息息相關，連帶影響博物館的展示方針，因而轉變至現今的面貌。藉由觀察日本對於臺灣原住民展示的觀點變遷，讓身處現臺灣的我們，應更可自省如何藉由博物館這個場域，更積極去面對及呈顯原住民多元的歷史面貌。

參考文獻

- 王嵩山，2012。博物館與文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王嵩山，2015。博物館、思想與社會行動。新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尤啟任，2011。文化的展示與變遷—以臺灣博物館為例。基隆：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永山定富，1937。內外博覽會總說。東京：水明書院。
- 伊能嘉矩，1907。東京帝室博物館に於ける臺灣土俗品，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55：400-401。
- 呂怡屏，2012。日本的民族學與博物館—兼論臺灣原住民展示，臺灣博物，31（3）：96-101。
- 呂紹理，2011。展示臺灣。臺北：麥田出版社。
- 李子寧，1997。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241-270。
- 李子寧，2011。博物館如何再現「歷史」：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收藏與展示。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李尚仁，2003。收藏的帝國：博物館作為科學研究機構的歷史，博物館學季刊，17（2）：37-44。
- 李威宜，2014。族群展示的反思：後威權臺灣的觀察，考古人類學刊，80：221-250。
- 並松信久，2016。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博物館政策の展開，京都産業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紀要，21：291-252。
-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2004。明治期府縣博覽會出品目錄：明治四年~九年。東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
- 東京国立博物館，1973。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国立博物館。
- 東京国立博物館，2018。東京国立博物館ニュース，747。
- 林頌恩，2012。從去殖民角度看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合作知識生產之道：以白鷺部落文史書製作為例，博物館與文化，4：31-68。
- 金山喜昭，2001。日本の博物館史。東京：慶友社。

- 畑中彩子，2014。集める、収める、愛でる—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博物館」的なもの，收於伊藤真実子、村松弘一編，世界の蒐集アジアをめぐる博物館・博覽會・海外旅行，頁 17-48。東京：山川出版社。
- 胡家瑜，2005。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3-39。
- 胡家瑜，2006。博物館、人類學與台灣原住民展示—歷史過程中文化再現場域的變形變化，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6：94-124。
- 胡家瑜，2012。離散的收藏與拼接的記憶—從臺灣原住民藏品資料跨國連結的二個例子談，博物館與文化，3：3-28。
- 胡家瑜、歐尼基主編，2018。他者視線下的地方美感：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文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許功明，1998。博物館與原住民。臺北：南天書局。
- 陳文玲，1997。台灣原住民文物資料調査と研究—東京国立博物館の收藏。1995 年度財団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
- 陳其南，2010。臺博物語：臺博館藏早期臺灣殖民現代性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2 月 16 日、1901 年 11 月 5 日、1907 年 4 月 24 日、1907 年 6 月 13 日，臺灣日日新報社。
- 蔡承豪，2017[0]。典藏品背後的迂迴曲折—以臺博館所藏「至哉坤元」匾為例，臺灣博物，36（3）：76-81。
- 蔡承豪，2019。跨境流動與詮釋建構—東京国立博物館藏牡丹社事件文物，臺灣文獻，70（2）：99-138。
- 盧梅芬，2015。從展示文本邁向我群與他者的溝通—原住民文化再現的策展脈絡與反思，博物館學季刊，29（3）：5-35。
- 錢曉珊，2006。殖民地博物館與「他者」意象的再現—三個日本殖民地博物館的分析比較。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藤下理周，1933。帝室博物館にある潘敦の肖像畫に就て，臺灣時報，昭和八年十月號：71-75。
- 讀賣新聞，1907 年 6 月 22 日，東京讀賣新聞社。

Bennett, Tony,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ies,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acDonald, Sharon, 1998.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Museums, Scienc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